

20世纪 中国 史学散论

瞿林东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世纪

中国

史学散论

瞿林东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史学散论/瞿林东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212 - 03420 - 7

I. 2… II. 瞿… III. 史学—中国—20 世纪—文集 IV. K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343 号

20 世纪中国史学散论

瞿林东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发 行 部: 0551 - 3533258 3533268 3533292(传真) 邮编: 230071

组 编: 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 0553 - 3883578 388357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23 字数: 354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2 - 03420 - 7

定 价: 6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我于1964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时隔一年多,“文革”开始,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也就中断了。当我重新开始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二三年的事情了。我的研究兴趣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并把唐代史学作为学步的起点。1989年出版的《唐代史学论稿》,正是我学步的记录。在后来的一些岁月中,我仍然以中国古代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并希望在前人和师长研究的基础上,多少提出一点新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陆陆续续出版的几本论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的这一心迹。

20世纪中国史学,不是我研究的重点。但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尤其是作为历史学学科的一门专史,自应努力做到上下贯通。对于我来说,尽管难以达到通识的境界,还是应当把古今贯通作为努力的目标。

我涉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始于1982年。那年,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在白寿彝先生指导下,起草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一文。此文经白寿彝先生审定,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我在起草此文时,主要依据白寿彝先生的两篇文章,即《回顾与前瞻》和《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9页作者附记)。因此,此文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思路都出自白寿彝先生,我只是做了一些充实资料和文字整理的工作。此文是较早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概括性评价的专文,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此文收入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作为此书的第九章。此后,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当代史学的短评和文章,如马克思和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色、怎样评介西方史学、新中国时期的史学理论成就等等,深感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应当多关注一



些当代史学发展问题,这对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很有帮助。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纪之交的临近,关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及其成就的问题,受到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和认真研究。由于受到这种时代条件和学术氛围的激励,我从不同的侧面撰写了一些有关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文章,也算是以此融入到世纪之交的这一股颇有声势的史学思潮之中,虽不能起到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希望作为这股潮流中的几朵浪花。当然,即使如此,这些文章也还是要受到读者和史学本身的检验。

本书所收录的二十几篇文章,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故分为四编。第一编“史学总相”,是关于 20 世纪史学发展的脉络、主要问题及名著的价值等方面的叙述和评论。第二编“理论探索”,着重讨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的关系、新中国史学在理论建设方面的进展,以及关于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问题等,讲了一些粗浅的认识。第三编“史家研究”,一是讨论了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梁、章二人可以看作是“新史学”之前驱的两位代表人物;二是就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尹达等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成就与特点及其史学地位作了初步探索;三是对我的几位老师的治学经历、学术风格与研究领域等作了一些回顾和整理,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温故而知新”。第四编“彰往察来”,顾名思义,这是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试图作一个总括性的回顾,彰显某些要点;同时对 21 世纪中国史学的前景,发表一点期待性的见解,可谓一孔之见,供史学界朋友参考。当然,这几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讲脉络和趋势,离不开讲理论问题;探索理论问题,自不能脱离对史家的评论;而关于史家的研究,又总是包含在这几方面之中;对于过去的回顾,必然联系着对于前景的瞻望。为便于读者的阅读,本书在各部分的编次上,没有以发表时间为序,而是考虑到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内部联系的需要予以编次。

本书另有两篇附录,一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这是叙述、评价一门专史的发展历程,因为这是作者的专业所系,故附于此。二是一篇访谈录,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有密切的联系,故亦附于此。由于本书并不是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作系统的和全面的论述,乃名之曰“散论”。

从史学史的观点来看,尤其是从历史观和历史理论的发展来看,反思



与进取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史学”,在批判“中国之旧史学”的基础上,力主以进化论的历史哲学指导历史研究,以揭示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次重要的反思。李大钊、郭沫若等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以揭示人类社会的结构、发展历程、阶段性特点及其发展的规律,并在社会史、思想史、中国通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这是更加重要的一次反思。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普遍开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取得了研究领域的新拓展、研究成果的新成就、理论探索的新境界等,这是又一次重要的和深刻的反思。可以相信,21世纪的中国史学,必将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前进,谱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篇章。

是为序。

瞿林东

2008年10月6日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编 史学总相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	2
百年史学断想	28
反思与进取	
——近 20 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初步分析	38
20 世纪中国史学及史学名著	45
《20 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题记	50

第二编 理论探索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56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61
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67
新中国史学 50 年的理论建设	71
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	86

第三编 史家研究

20 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	98
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110
李大钊与《史学要论》	121
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为纪念郭沫若诞生 100 周年而作	133
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153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161
择善而固执 上下而求索	
——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	172
重考证之功 贵自得之学	
——为祝贺赵光贤教授 90 华诞而撰	186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	199

第四编 彰往察来

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	242
深入研究 20 世纪中国史学	247
中国史学:20 世纪的遗产与 21 世纪的前景	253
关于影响 21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266
前提和路径	
——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	276
[附录一]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	299
[附录二]理性地对待过去 坚定地面向未来	
——瞿林东先生谈 20 世纪中国史学	346
后 记	361

第

一

编

史

学

总

相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则是从史学本身来看,这一百年的史学在性质上的变化和成就上的辉煌都值得大书特书;二则是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来看,这一百年的历史发展对于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史学发展对于历史发展的反作用,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历史学的认识,进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及其丰富内涵与现代价值的认识。这种变化和进步是空前的,尽管历史学在这一百年中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和坎坷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根本性质与整体面貌。

一 引言:怎样认识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

怎样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 首先会碰到一个问题,即理论和方法问题。理论,是指用什么样的思想作指导来观察 20 世纪中国史学。方法,是指用什么样的方式(形式)来反映这种观察所得。当然,理论和方法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即不能脱离对于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我们通常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概括说来,就是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清代史家章学诚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②。他讲的是文学批评的原则,对于我们观察 20 世纪中国史学和史学家,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要努力总揽其发展趋势,尽力揭示其基本规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5 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律,力求做到把握其总相和实质,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这样那样的局限或这样那样的偏颇。

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要认真对待那些在史学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潮。一定的史学思潮不仅是史学发展中极明显的外在表象,而且是史学发展中的内在活跃因素之一。史学发展中既有积极的思潮,也有消极的思潮;而对于思潮的划分和剖析,是史学史研究中最繁难的问题之一。

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要在全面考察中尽可能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一般罗列。所谓重点,一则是指在 20 世纪史学发展方向上和主要成就上,占有突出的位置;二则是指对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遗产、经验教训。

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自然要研究评价这百年中有突出成就、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家。史学家是史学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主体的活动则无以讨论史学。唐人刘知幾对评论史家,多有精辟见解,可以发人深思。刘知幾认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①。宋人吴缜评论史家作史,提出事实、褒贬、文采三个原则^②;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以“史才三长”、“史家四长”论史家得失,等等^③。这都表明,研究和评论史家,实为认识史学发展之重要环节。近 20 年来,有史学家评传合集的出版,也有史学家评传丛书或专书的出版,都反映出人们对史学发展的一种认识方法或认识途径。《历史教学》杂志亦有志于此,自 1999 年第 2 期至 2000 年第 2 期,发表了关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上有较大影响的 13 位史家之成就的评论文章,于读者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多有裨益。

以上这几个方面,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庶几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有一个全面的和辩证的认识。这是努力的目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但这个努力的目标是应当明确的。

① 《史通·辨职》,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②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③ 分别参阅刘煦等:《旧唐书》卷 10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中华书局 1961 年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二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

我们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首先要认识 20 世纪中国历史,这是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决定了前者发展的面貌。认识 20 世纪中国历史,又要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这个反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经历 109 年;20 世纪前半期,就包含在这 109 年之中。我们认识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自然不应脱离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共和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许多成功,也有不少失误。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经历着胜利、挫折、崛起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②。近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改革和开放的道路上,正在走向伟大的振兴。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距离我们现在更近一些,许多人的感受也会更深一些。可以这样说,凡重大的事变或转折,都有亿万人民的惊心动魄与之相伴,都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思想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及面貌。我们认识 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自然也不应脱离 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的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认识,从历史同史学的关系来看,是否可以作以下概括:

——19 世纪末,民族危机加深,变法维新思潮日盛,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于是在 20 世纪初年有梁启超“新史学”的提出,并产生了强烈的回应和长久的影响。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进行反清斗争,至辛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6、632 页。

^② 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7 ~ 228 页。



亥革命的爆发,其间乃有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的政论和史论的出现。

——内涵丰富的新文化运动和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推动了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方法的传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于是有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史学家们在历史观上的进步,一方面也加强了史学对于社会、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后者更在发展方向上显示出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变革。但是,自 50 年代中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的思潮,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运用,也给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损失。1949 年至 1966 年的 17 年间,中国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悲剧,也大“革”了文化的“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一切正直的史家遭到无情的打击,这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所遭受到的最黑暗的年代。

——1978 年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中,中国史学经过艰苦的拨乱反正,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积极引进、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认真总结和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中国史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

从唯物史观来看,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些常识问题。然而,正是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反倒容易被人们所遗忘,以致在考察问题的时候犯常识性的错误。应当强调的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究竟怎样认识;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歧异,会直接导致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之认识上的歧异,这是毫无疑问的。认识上的歧异,这在学术研究领域是正常的。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尽力使关于史学的认识符合于产生它的客观历史条件,并合理地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

——20 世纪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历史,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五四运动前后、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较为突出,而以八九十年代为最。

——20 世纪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对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如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对史学的影响都甚为明显,在观念、材料、方法上给予史学发展以积极的推动作用。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还有自身的传统和积累。譬如:18 世纪,以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为代表的历史考证学派,以及以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的史学理论思潮,都对 20 世纪史学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19 世纪,中国史学开始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即由古代史学发展到近代史学的转折;20 世纪前期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正是这一转折的延续和提升,而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变化与进步的历史思想,则贯穿于这一过程之中。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认识到,总结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和优良传统,对于现今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认识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并将继续扩大其影响和作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种种条件,20 世纪中国史学又反过来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 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关于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基本规律的认识,目前尚处在探讨的阶段,对于它们的认识也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里提出的一些看法,无疑是带有探索的性质。

趋势,是指事物发展的大势和动向。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一是近代化和科学化逐步深入的趋势;二是社会化和大众化逐步扩大的趋势;三是逐步自觉面向世界的趋势。

中国史学自 19 世纪中期以后,开始了由古代史学走向近代史学的重大转折过程。这个过程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主要标志是:史学家们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强了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和对外国史地的研究,救亡图强和“睁眼看世界”成为当时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史学家们的治史宗旨。在



社会历史观念上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疆域意识都逐步地从传统的皇朝观念、“华夷”观念等蜕变出来,而显示出比较鲜明的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中国史学之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固然还未能脱离对于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的追怀,但史学家们思考更多的已是西方的技术与制度和日本社会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在历史观上,传统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开始同西方近代进化论相结合,逐渐形成新的历史进化观。张穆、姚莹、何秋涛、魏源、梁廷枏、徐继畲、黄遵宪、王韬、夏燮等人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上述特点。

20 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化趋势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逐步深化的。其深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史学之近代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这个理论体系是以西方近代进化论为核心,而在研究方法上则注重对于史料的整理、鉴别和对于专史的研究,其近代学科分类的观念日渐清晰。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摆脱了传统经学的影响,并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新史学”所力倡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区别于 20 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一方面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有的为新历史考证学派所推崇和吸收,有的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肯定和发展。它们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甚至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

以王国维为开山的 20 世纪新历史考证学派,不仅在历史考证和文献考证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运用传世的文献资料和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相互印证方面,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如果说,“新史学”主要是从历史观念上突破古代史学的窠臼的话,那末新历史考证学则主要在科学方法上创造了自身的辉煌。“新史学”的倡导涌现出了冲锋陷阵的勇士,而新历史考证学派则造就一批严谨求真的大师。他们活跃于 20 世纪前期中国史坛,推动并且深化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一些中国学人所理解、所接受。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早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著作。20 年代末,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并在 1930 年正式出版,震动了中国历史学界。从此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活跃于三四十年代。他们的著作,代表着一个新的史学



发展方向,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并据此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即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李大钊有非常明确的阐述。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今与古》、《史学要论》等论著,用全新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和史学作了精辟的解释^①。这些解释,一方面赋予中国史学遗产中所包含的关于历史之朴素的进化观点和朴素的辩证观点以合理的说明,一方面又把近代进化论推进到辩证的发展观,从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运动规律作出了科学的论断。可以肯定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才真正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道路;换言之,历史学也得以真正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当然,历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和笔直的。在这条道路上,需要有一批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劳动,以至生命的终结;在这条道路上,史学家也走过一些弯路,经历过异常严峻的考验,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出现过不少失误。尽管如此,正确的方向已经确立,科学的道路已经开辟,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历史学的前景定是广阔的和充满生机的,这已由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所证明。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反映出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趋势。这一趋势是同 20 世纪中国近代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学术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高等学校中史学系(历史系)的设立,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有关历史学的学术刊物的创办和报纸上有关历史与史学栏目的开辟等等,为史学的社会化趋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20 世纪中期,有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注意到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创新,一方面也注意到历史知识的普及,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方面,吴晗是一位备受人们推崇的有成就的史学家。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在社会化和大众化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重视,具有空前的广泛性,适应社会各种层次之要求的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内容的博物馆、纪念馆

^① 参阅《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的建立等等,说明历史学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种局面,是20世纪以前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在史学更加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即猎奇和媚俗的倾向,这是不可取的,是应当加以抵制的。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走向世界。较之于前两个趋势,这一趋势显得迟滞得多,其势头也显得微弱。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中,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有过几次高潮,对此,近年已有专文讨论^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交流”,主要是“引入”、“引进”,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很不够的。从历史条件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正常的。第一,在近代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已走在世界前列。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来,引进西学的潮流不断发展,史学亦是如此,这是符合历史运动的规律的。第二,这种潮流的合理与强大,势必掩盖了事物发展中的另一种必要性和合理性,即不曾认真总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积极地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去。尽管毛泽东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再强调总结历史遗产的极端重要性^②,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在五六十年来做了不少积极的努力^③,但从史学遗产来看,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还只是10年左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趋势自然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界,那种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的自觉意识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近2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已多次出席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中国史学家出国考察、访问、研究、讲学也越来越广泛,中国史学家的论著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国传播等等,表明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势头正在日益加强。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这本不到30万字的“普通历史读物”,本是着意为外国读者撰写的。自1980年以来,它已出版了英、日、德、法等七八种外文本;而其中文本则已

① 参阅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我国新时期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若干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② 参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③ 参阅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2~486页。